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研究： 以阿根廷为例

曹 勇

内容提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分配格局，便于发达国家利用各种贷款条件的实施，影响发展中国的经济政策乃至政治事务。本文分析了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如何透过 IMF 的贷款条件，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塞进阿根廷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IMF 是一部推广有利于发达国家游戏规则的精密机器，对 IMF 贷款政策的主导，使美国获得了一种可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相媲美的金融“软实力”；它有利于美国输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经济模式，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对借款国的经济渗透与控制。

关键词：IMF 贷款条件 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 阿根廷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贷款条件与贷款程序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 IMF）的主要职能是以特定方式向成员国提供贷款，帮助其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稳定货币关系。与普通商业性贷款不同，IMF 融资具有较为苛刻的贷款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

概括地讲，所谓“贷款条件”是指成员国与 IMF 合作制定政策的一般性承诺。1952 年，根据 IMF 执行董事的决定，IMF 贷款具有“临时性”和“周转性”，成员国向 IMF 借款时须提出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并附一项稳定经济的规划。1969 和 1978 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两次修订中，均增加了有关贷款条件的条款。1979 年，根据以往实践的经验，IMF 执行董事会通过了《贷款条件指针》，该指针共 12 条，对贷款条件和贷款程序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通常会启动

与 IMF 的融资协商过程，这一过程的标准程序是：由借款国所在的 IMF 地区分部草拟一份援助计划提案，经 IMF 总裁同意后，派遣一个由 4-6 位经济学家组成的工作小组与借款国展开磋商和谈判，如果谈判顺利，借款国将签署一份名为意向书 (letter of intent) 的文件，意向书的中心内容是借款国必须进行的政策调整，以及客观反映政策实施情况的绩效标准。IMF 贷款一般采用“备用安排”方式，在备用安排中，贷款条件以“实施标准” (performance criteria) 出现，贷款采取分阶段提款制，即成员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半年、一季度或两个月，达到备用安排中规定的实施标准，才能分批提取额度内的贷款。借款国要向 IMF 总裁递交意向书，同时提交的还有 IMF 工作小组的报告，IMF 总裁在参考工作人员报告后决定是否接受意向书，并以借款国名义向执行董事会请求批准贷款。经执行董事会批准后，借款国就可以从 IMF 提取第一批款项，此后的提款期内，IMF 将定期检查实施标准执行情况，评估有关政策与规划目标的一致性。如果借款国未能达到调整规划所定目标，提款就会自动中止，但

作者简介：曹勇，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本文获 2005 年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资助。

借款国仍可根据备用安排中的“政策谅解”条款与IMF进行谈判,确定新的调整规划,包括新的贷款条件,以求恢复IMF的贷款。

根据《IMF协定》第12条第3款,IMF执行董事会各执董的投票权与其所属国家和选区在IMF的份额挂钩,成员国份额主要由该国的经济规模决定。^①如表1所示,IMF投票权的分布极不平衡,仅美国一国就占了IMF总投票权的17%。为控制IMF的决策权,美国通过对《IMF协定》的修改,不断增加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且在原来70%特别多数票制度以外,新增了85%特别多数票制度,这事实上赋予了美国在许多关键事项上(如成员国份额变更、增减执行董事会成员等)的惟一否决权。虽然作为整体,发展中国家在IMF拥有的投票权已超过一半,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完全相同,相互之间很难形成一致意见,在执行董事会中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即便在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的事项(包括贷款)上,发达国家也占有上风。Rapkin & Strand(1997)发现,由于缺乏天然的反同盟,美国在IMF执行董事会的实际投票权重高达62.3%,基本上左右了IMF的各项决策。^②

表1 IMF部分执行董事会成员及投票权重^③

执行董事会成员	投票权	占IMF的投票权重%
美国	371743	17.08
日本	133378	6.13
德国	130332	5.99
法国	107635	4.95
英国	107635	4.95
俄罗斯	59704	2.74
沙特阿拉伯	70105	3.22
中国	63942	2.94
中东阿拉伯国家(16国)	70852	3.26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23国)	30749	1.41

资料来源: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eds.htm>, 数据更新时间为2005年3月11日。

^① IMF成员国份额的计算方法,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数学公式,但IMF认为数学方法不能全面反映会员国在基金组织的地位,因而未正式使用这一公式计算成员国的份额或以此为根据进行份额的调整。

^② Rapkin, D and Strand, J (1997)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haring or Contesting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52) .p265.

^③ 执行董事会是IMF的常设性决策机构,由24名成员组成,其中出资最多的美、日、德、法、英5国直接指派1名;沙特阿拉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单独选区,各拥有1名国家执行董事;包含若干国家和地区的其余16个选区,各选一名执行董事作为它们的集体代表。

^④ Kapur, D. (2001), "Expansive Agendas and Weak Instruments: Governance Related Conditiona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4 (3), p207.

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IMF正式运作以来,IMF执行董事会很少就贷款举行正式投票。根据IMF理事会和执行董事会《规则和规章》(By-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作为执行董事会主席的IMF总裁应尽量主张各成员国协商取得“共识”,而不是径行付诸表决,其目的是避免表决陷入僵局,形成成员国之间的尖锐对立。即便如此,我们仍不难想象,在这种所谓的“柔性安排”下,执行董事会的“共识”会偏离其投票权的分配格局。

二、IMF贷款条件与“华盛顿共识”

长久以来,IMF的贷款条件颇受争议,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焦点问题。作为IMF的主要贷款对象,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把持了IMF贷款的决策权,并通过各种贷款条件的实施,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乃至政治事务,特别是美国,被指责惯常利用对IMF贷款条件的操控来获取经济和外交利益。

根据《贷款条件指针》第9条,IMF贷款条件的具体内容一般仅涵盖宏观经济变量,如国内信贷、公共部门赤字、国际储备和外债,以及价格体系的要素如汇率和利率等。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当某些微观经济变量由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关系到调整规划的执行时,贷款条件才会涉及微观经济变量。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IMF的贷款条件开始频繁地触及微观经济变量,进入90年代后,IMF贷款条件中的微观经济变量有增无减,且呈现出从原则性规定向具体措施变化的倾向。Kapur (2001)计算了IMF备用安排中实施标准数目的增加情况:以25个国家为例,1980年代是6到10项,1990年代则有大约26项。^④此外,IMF贷款条件中“市场导向”的措施也骤然

增加, 这些措施除了传统的推行私有化和支持私营部门发展外, 还包括减少对投资与贸易的干预, 开放金融部门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 IMF 贷款条件扩张之举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 “华盛顿共识” (有关具体内容见本刊 2005 年第 9 期第 55 页)

的痕迹。表 2 中列出了 IMF 与埃及 3 次备用安排中的贷款条件, 这是 IMF 对发展中国家贷款条件的标准模式, 从中可看出, 这些条件与 “华盛顿共识” 的十点政策主张极其相似, 这显然不能用巧合来加以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 在国际金融市场, 存在一

表 2 IMF 与埃及 3 次备用安排中的贷款条件

贷款条件	1987年备用安排	1991年备用安排	1993年备用安排
统一汇率			
货币贬值			
削减财政赤字			
提高利率			
提高能源价格			
减少政府补贴			
税制改革			
私有化			
投资改革			
银行自由化			
贸易自由化			
解除租金管制			
放松劳动市场管制			
资本市场自由化			

资料来源: Bessma, M. (2004), “American politic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2004:880-904. 表示备用安排中要求履行的实施标准。

种外国政府、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 “交叉条件” (cross conditionality) 默契, 即国际债权人是否愿意继续给借款国提供贷款或债务延展, 必须视该国是否与 IMF 谈妥政策调整规划, 并获得 IMF 的备用安排为先决条件。IMF 的该项功能被称为成员国从其他途径获得资金融通的 “标准戳记” (seal of approval), 它使得 IMF 在与成员国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 迫使借款国接受贷款条件, 从而将 “华盛顿共识” 的各项政策主张落实其中。

三、IMF 贷款条件与 20 世纪 90 年代阿根廷的经济改革

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各国是 “华盛顿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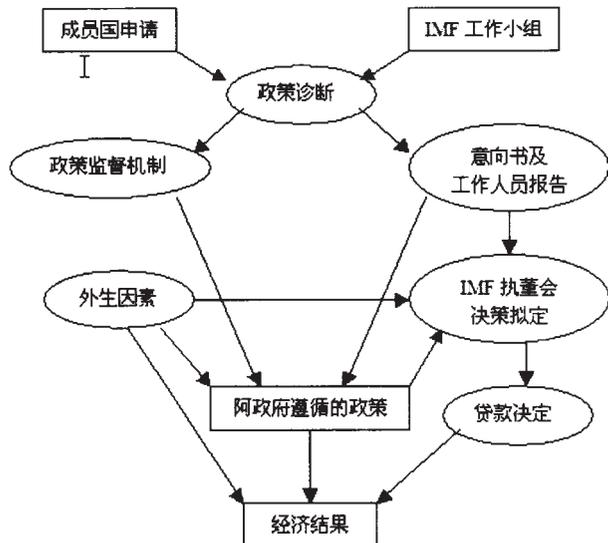
识” 的最初试验田,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 其中在阿根廷的推行与实践最具代表性。

1989 年初, 因债台高筑的阿根廷政府无法接受 IMF 严苛的贷款条件, 其他多边金融机构和国际商业银行也拒绝对阿根廷发放贷款, 阿国内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美元抢购风潮, 进而引发经济与社会秩序失控, 迫使时任总统阿方辛在同年 7 月提前下台, 由刚赢得总统选举的梅内姆接任。梅内姆政府上台后, 立即寻求恢复与 IMF 的贷款谈判, 同时提出一揽子结构改革方案, 包括对公共部门大规模私有化, 取消大部分政府补贴, 在贸易方面则取消进口的一切数量限制, 并逐一将金融体制和外国投资体制自由化, 社会保障体系也部分私有化和解除管制。^①在梅内姆政府改革计划的制定过程中,

^① 王庭东: “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崩溃及启示”, 《拉丁美洲研究》, 2002 年第 4 期。

IMF 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参与并主导了阿根廷的经济改革计划（图 1）。

图 1 IMF 贷款决策与阿根廷经济改革关系图



资料来源: <http://www.imf.org/external/np/ieo/2003/ar>.

尽管阿根廷领导人从未公开表示认同“华盛顿共识”，但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带有明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烙印。以供给学派为例，供给学派认为，为避免通货膨胀造成平均和边际税率的提高，必须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发行的担保准备，决定货币增加的数量，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正是梅内姆政府经济改革的核心“兑换计划”和货币局制度的核心内涵。表 3 中列出了梅内姆政府第一任期内的主要经济改革计划与 IMF 贷款之间的关系，通过一系列贷款条件要求，IMF 几乎将“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完整地塞进了阿根廷政府的经济改革方案。

1995 年 5 月，梅内姆再次当选为阿根廷总统。透过 1996~1999 年间阿根廷与 IMF 签订的 3 份官方文件，即“经济政策谅解备忘录”的部分要点，我们可管窥梅内姆政府第二任期内经济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

表 3 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改革计划与 IMF 贷款关系简表 (1989~1995)

阿根廷经济改革计划	IMF 贷款
1989 年 7 月，阿根廷经济部长公布改革措施，包括冻结价格、货币贬值、大量减少政府赤字和税制改革；	1989 年 7 月，在与阿根廷的借款磋商中，IMF 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条件；
1989 年 8 月，阿国会通过《国家改革法》和《经济紧急状态法》，授权政府分两阶段私有化 32 家主要国有企业、取消大部分政府补贴等；	1989 年 9 月，阿政府宣布与 IMF 达成 15 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
1989 年 10 月，阿政府承诺实现贸易自由化，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第二年取消课征进口附加税；	1990 年 2 月，因未完成经济目标，阿根廷的提款被中止，5 月底，阿政府向 IMF 提交新的意向书；
1990 年 11 月，阿根廷航空公司、国营电信公司私有化；	1990 年 12 月，IMF 向阿根廷发放了 1989 年通过的 2.67 亿美元备用贷款；
1990 年 11 月，阿政府扩大增值税税基，将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业纳入其中，实行新的联邦与省政府的财权分权；	1991 年 7 月，IMF 给予阿根廷 11 亿美元备用安排；
1991 年 3 月，阿国会通过《货币兑换法》，于 4 月 1 日开始实施货币局制度；	1991 年 8 月，美国宣布阿根廷具备加入布雷迪计划的资格；
1991 年开始的第二阶段私有化，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的国有企业，并进行大规模人事精简；	1992 年，IMF 总裁对阿根廷经济表现给予肯定，并同意草拟新的扩展贷款计划；
1992 年 3 月，取消股票发行与交易税，对外国投资者的股票交易免征所得税；	1992 年 4 月，在 IMF 协调下，阿根廷与债权银行初步达成调整中长期债务的协议，重组 250 亿美元债务，1993 年 4 月正式签约；
1992 年 9 月，阿国会通过《中央银行组织法》，将央行从政府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	1992 年 7 月，IMF 向阿根廷提供为期 3 年，总计 30 亿美元的扩展贷款；同月，阿根廷与巴黎俱乐部达成协议，重组 1992~1994 年到期的部分债务，将偿还期定为 16 年，宽限期 4 年；
1993 年 6 月，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 (YEP) 私有化；	1995 年 3 月，阿根廷与 IMF 签订 70 亿美元的贷款协议，为应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并负责监督阿根廷的金融体系运行。
1993 年 9 月，阿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改革法案，将退休保障系统分为国营和民营两种，并逐年提高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	

在《1996 年 3 月 14 日经济政策备忘录》中记载：阿根廷的货币政策将继续由兑换计划主导，同时开放外国银行的进入以增强竞争，省银行私有化，合并或兼并脆弱的金融机构；税收方面，国会

授权政府取消某些所得税，取消商业租金和交通、卫生部门的附加税；联邦政府与省政府合作减少 1996 年赤字问题，联邦政府须检讨与各省间的财政划分安排；改革退休、医疗及社会福利机构，世

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将共同协助各省社会保障计划;贸易方面,加强与南锥体共同市场和国际市场合作,推进矿业、林业、食品、汽车、能源和石化等产业的改革,保持对投资者吸引力;1996年发行20亿比索短期政府债券,用以支付公共部门未偿还债务和保护债权人利益。^①

《1997年12月3日经济政策备忘录》中记载:希望将1997年的联邦政府赤字降到45亿比索(占GDP1.4%),1998年降至30亿比索(占GDP1%),以维持公众对兑换计划的信心,政府将努力获得外国银行贷款以提高国内银行的流动性;经过1995年开始的再造措施,许多金融机构被合并、清算或私有化,银行数量比1994年减少约10%,银行的外国资产比率也从1994年的16.5%上升为40%;政府承认劳工市场保持弹性的重要性,并力图获得最高法院对《劳工法》改革的支持,包括明确减少遣散费用、逐步删除特别劳工条款、劳工协商的地方分权等;修改联邦政府内部审计程序和公职准则,国有银行Banco de la Nacion私有化,1997~1999年开始私有化国家抵押银行(Banco Hipotecario Nacional),并着手其他银行与省公共企业的私有化;政府将向国会提交新反垄断法,继续促进市场开放,降低税赋及解除使市场功能受阻的规定,从1998年1月1日起,减少进口商品的统计税0.5%;政府希望国会尽快通过1994年宪法中的司法改革,包括设立独立审判委员会,法官委任及行为监督等。^②

《1999年1月11日经济政策备忘录》中记载:财政政策方面,希望国会能于近几个月内通过《财政责任法》,此法将限制现阶段公共开支,建立财政稳定基金,缓和税收所受外部冲击衍生的循环性波动;加强税务行政,改善税务审计措施,严格管理附加税发票的管理,加速税收司法案件的判决;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医疗卫生市场的竞争力,为养老金领取者提供基本福利,为低投

保者提供资助,改革健康保险条例;联邦政府帮助各省落实1993年联邦教育法和1994年联邦教育协定,延长普通义务教育年限,改进中等教育水平;进一步落实私有化及政府控制下企业的租借,早日结束关于电信频率的租借司法案,租借核能电厂和水电厂,完成国有银行Mortgage的私有化和出售YPE的残股;建立国家司法会议,管理法官任用并监视其活动,加强国家辩护律师作用。^③

可见,第二届梅内姆延续了第一任期内所实行的各项改革,其内容除“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政策主张外,还延伸至阿根廷国内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等领域。

四、IMF贷款条件背后的金融霸权与资本扩张

尽管IMF一再宣称其为政治中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并强调其贷款政策确实是在替国际收支失衡乃至出现危机的成员国寻求解决之道,但IMF贷款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贷款条件变化,说明它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益的政策工具。

二战后,实行固定汇率制度,避免各国间竞争性货币贬值推动自由贸易,显然符合美国这一全球头号经济强国和最大债权国的利益,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MF则获得了维持这一体系有效运转的“永久性”国际金融机构地位。IMF的贷款,曾是西方遏制社会主义和拉拢第三世界的重要武器。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往往被IMF要求执行更为苛刻的贷款条件,实行市场导向经济政策的国家较之政府计划主导的国家,贷款时更容易得到IMF执行董事会的青睐。^④Killick(1995)以17个国家为样本,发现对西方有重要战略利益的国家从IMF借款时得到了更多的关照。^⑤

^① Argentina: Memorandum on Economic Policy (March 14, 1996), <http://www.bara.gov.ar/polmon/pm040000.asp>.

^② Argentina: Memorandum on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3, 1997.

^③ Argentina second Review Under the Extended Arrangement Letter of Intent January 13, 1999, Argentina: Memorandum on Economic Policy (January 11, 1996), <http://www.bara.gov.ar/polmon/pm040000.asp>.

^④ Blackmon, P. (2000), "The IMF: A New Actor i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 in Proceedings of the 41st Annu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Los Angeles, pp1~16.

^⑤ Killick, T. (1995), "IMF Progra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sign and Impact",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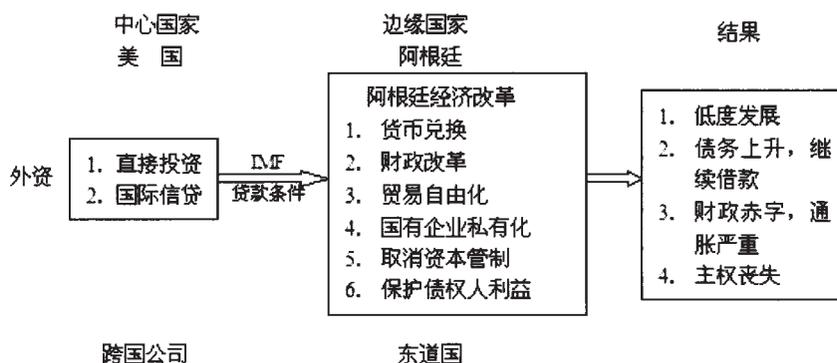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 IMF 的存在一度受到质疑,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系列经济困境,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债务危机,给 IMF 的转型提供了机遇。通过一系列新的融资项目,西方国家将 IMF 的职能从协助成员国克服短期国际收支危机扩大至经济发展层面,并在贷款条件中加入诸如开放资本帐户、私有化和解除政府管制等政策建议。“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更为突出,通过对 IMF 贷款政策的主导,美国在货币金融领域获得了一种可与政治、军事等“硬实力”相媲美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为美国的金融霸权提供了便利的权力资源,其本身也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美国掌握了制定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语权,输出英美的市场经济模式,推行有利于西方的游戏规则,对借款国经济进行渗透与控制,达到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目的。

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反映了世界经济的权力分配格局,其贷款行为事实上是一种“中心-边缘”国家之间所进行的

金融帝国主义的延伸。Dos Santos(1999)指出,IMF 贷款是扩大跨国公司与借款国进行接触的重要方式,并建立了一个融资模型分析国际资本如何通过 IMF 和跨国公司两个渠道控制债务国的经济主权:由美国控制下的金融机构如 IMF 对债务国提供贷款,借款国政府承担偿还义务,并承诺将贷款条件内化为改革的必要步骤;通过经济开放和私有化进程,IMF 的贷款转化为跨国公司在借款国的投资或合资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于东道国的重要产业和利润丰厚行业,要求制定法律保障其投资利益,并干预东道国出口、外汇乃至课税政策;跨国公司以专利权或采用西方过时的机器设备,阻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使之与当地银行系统建立密切联系,控制东道国金融体系,实现金融资本的国际化。^①在这一融资模式下,东道国始终无法卸下沉重的债务包袱,经济主权不断丧失,大量财富被来自核心国家的跨国公司掠夺,经济无法得到真正的发展。图 2 中是本文用 Dos Santos 融资模型对阿根廷的分析。

IMF 主导的结构改革方案,为阿根廷在 20

图 2 阿根廷融资模式与结果



世纪 90 年代初赢得了新自由主义模范生的声誉,一度被西方称之为“阿根廷奇迹”。梅内姆政府第一任期内,阿根廷的通胀率从 1989 年的 4 位数下降到了 1995 年的 1.6%,GDP 的年增长速度,也从 1989 年的-6.2%上升到 1994 年间的 7%,国家财政出现赢余,国际收支得到改善,1991~1994 年间,共有 3500 多家外国公司到阿根廷投资,投资额达 362 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 10 个国家之一。^②但表面风光的数字却无法掩

盖阿根廷经济的深层危机,1991~1994 年,阿根廷三分之一的经常项目逆差是用私有化吸引的外资所填补的,阿根廷政府利用私有化获得的 200 多亿美元收入中,约 133 亿美元用于冲销国内外债务。私有化使阿根廷几乎卖光了能源、通信、电力和核电厂等战略性国有企业,码头、港口、机场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和矿山等资源性行业也相继成为跨国公司的囊中之物。外国资本全面控制阿根廷的经济体系,使阿根廷成为拉美经济跨国公司化

^① Dos Santos & Theotónio, 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版。

^② 刘杨:“梅内姆连任总统后阿根廷的趋向”,《现代国际关系》,1995 年第 9 期。

的典型国家,至 1999 年,由阿根廷政府掌握的企业已所剩无几,全国 100 家大企业销售量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由 1989 年的 24% 上升至 50%,加上合资企业,这一比率更高达 70%。此外,跨国公司还控制了阿根廷出口额的 90.4% 和进口额的 63.3%。^①显然,以此为代价的“经济奇迹”的基础是极其脆弱且难以长期为继的。

梅内姆政府第二任期伊始,受 1994 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冲击,阿根廷经济出现衰退,1995 年的 GDP 增长率为 -4.4%,失业率高达 15.9%,外资纷纷撤离,政府税收也大不如前,加之私有化收入大幅减少,财政赤字开始增加,货币政策又受制于“兑换计划”,面对国内外的经济困境,别无它法的梅内姆政府只好再度向 IMF 请求援助,IMF 在提供短期融资的同时,也一如既往地开出了与以前同样的药方。1996-1997 年,阿根廷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但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下跌,阿根廷的贸易条件开始恶化,1998 年爆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借贷利率急剧上升,阿根廷的债务负担加重,外债总额从 1995 年的 871 亿美元增至 1998 年的 1094 亿美元,债务利息支出占出口比率亦从 1995 年的 28.2% 增至 1998 年的 35.3%,其中近 6 成是政府债务。1999 年初爆发的巴西金融危机,更给积重难返的阿根廷经济以沉重打击。继梅内姆后上台的德拉鲁阿政府,虽然是中左联盟的保守派,仍延续了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在 2000 年 9 月递交的借款意向书中,承诺完全支持 IMF 给阿根廷开出的改革药方,但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结合在一起,使阿根廷一步步陷入困境之中,终于在 2001 年底爆发了三位一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

策自然由强国所制定,不可否认,IMF 的某些贷款条件有其合理性,但从整体上看,这些条件往往脱离借款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为后来爆发的各类危机埋下伏笔,并严重地削弱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虽然“华盛顿共识”在拉美的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核心国家的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不会停止,IMF 也因此会继续被美国委以重任,充当维持国际经济与货币秩序的金融警察,并将各种概念融入其贷款条件之中,推广有利于西方的游戏规则。

对于 IMF 的本质,有识之士早有清醒的认识,加莱亚诺(1971)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轰炸有助于征服者登陆,这个组织的种种忠告遍及拉丁美洲各地,今日,大部分政府仍盲目地遵从该组织的指示,但治疗的方法反而使病情恶化,以便更好地迫使病人接受贷款和投资之类的毒品”。^①尽管阿根廷视 IMF 为帝国主义干预者,曾一度拒绝加入 IMF,但不时爆发的债务危机使阿根廷与 IMF 的借款谈判几乎成为各届政府的例行公事。虽然因为不满 IMF 设定的苛刻贷款条件,阿根廷与 IMF 的谈判在协议签订-执行-中止-再谈判的模式中不断重复,但最后结果基本上是以阿根廷的屈服而告终。对于阿根廷,完全脱离与 IMF 等多边金融机构的接触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关键是要对其开出借款条件有所取舍,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政策和改革计划,同时有效利用外部资金,使之用于破除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有这样,阿根廷才能摆脱对 IMF 和国际垄断资本的依赖,跳出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使本国经济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健康发展,这一教训同样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与反思。

五、结论与启示

(责任编辑:冯郦君)

作为强国的利益代言人,IMF 的的贷款政

Abstract: The power allocation architecture of IMF makes it easy for the superpower to intervene in the loan negotiations and influence the outcomes. During Menem's administration, Argentina adopted a series of Neo-liberalism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that embodied Washington consensus in order to use IMF's resources. As an elaborate-designed machine to promote the game rules in the interes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United States has obtained a unique financial soft power, which can help it pursue the hegemony interest and control debtor country's economic sovereignty.

Keywords: IMF; Loan Conditionality; Washington Consensus; Neo-liberalism; Argentina.

^① 沈安:“阿根廷经济跨国公司化及其后果—阿根廷金融危机探源之一”,《拉丁美洲研究》,2003 年第 2 期。